

「港獨」喬裝打扮成「自決」

「港獨」歪風亂港久矣。現在有關政黨又口徑一轉，以「自決」一詞取代離經叛道的「港獨」口號，企圖迷惑人心。除了幾個「傘後」組織相繼成立政黨，鼓吹「公投自決」外，反對派政黨的一批中青代，包括工黨、公民黨、民主黨等又聯合發表一份《香港前途決議文》，當中再次出現了「自決」一詞，只不過這次是由「公投自決」改為「內部自決」。其論述稱要「透過內部方式實現《公民權利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和《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所保障的人民自決權，由香港人民自由決定香港政治地位，並自由謀求經濟、社會和文化發展。」又稱港人能按「內部自決」原則實現自決權，「永續自治」將是處理二次前途問題的恰當選擇。當中不僅刻意避開了「港獨」「獨立」等敏感字眼，在論述上更模糊不清，妄想迷惑港人。

《決議文》欺騙民眾

何謂以「內部自決原則實現自決權」？在「自決」一詞被濫用的現階段，這種說法其實等同於「以抗爭的方式實現抗爭」「以港獨的方式實現港獨」。同時激進派的口徑

由「港獨」到「自決」的轉變也耐人尋味。是「港獨」思維被拋棄？還是因為該詞過於激進，令港人難以接受，需要重新包裝才能讓有關政黨繼續蒙騙？而「本土」論一再被利用，激進派以此不斷煽動「認同本土核心價值和文化」的市民與政府對抗，其本質與「港獨」又有何不同？《決議文》通篇顛三倒四，混淆視聽，究其原因，卻是為爭取9月立會選舉的選票。反對派刻意避開「港獨」字眼，實質是換湯不換藥，旨在訴求上拉近與選民的距離，製造假民意。並非真的為民發聲，更不要說為民謀利了。

激進派近期的口風轉變，正說明了「港獨」激進思維不被社會認可，因此需要另闢字眼，以騙取更多市民包括選民的認同。細觀其訴求，「自決」與「港獨」之論具有諸多共同點：第一、堅持與政府對立的立場不變；第二、從各方面否定本港與內地的良性互動；第三、抵制甚至妄稱要改寫《基本法》這一本港憲制性法律；第四、是始終將違法暴力抗爭作為必要手段。因此無論是「公投自決」「前途自決」還是「內部自決」，其「港獨」本質沒有改變。因「自決」字眼卻比「港獨」帶出更多的情感色彩，意圖迷惑港人，尤其是受「佔中」影響的年輕一代



指點香江
張學修

選民。
縱觀近期由「傘後」組織成立的幾個新政黨，一開始就聲稱要備戰立會選舉，政治野心路人皆知。因此在具體論述上的「修飾」，不過是策略上的調整而已，其訴求仍是違法違憲，硬傷明顯。而反對派中年輕一代稱改寫《基本法》的說法更屬荒謬無知。香港的憲制性法律不可能隨便改寫，《基本法》作為本港的法律基石不能隨便動搖，本港的民主發展不能成為衝擊法治的藉口，而主權問題更不是以「言論自由」等藉口能夠妄自非議的。年輕人熱心政治本沒有什麼問題，但須守憲守法，建立正確的價值觀，立足於現實，否則只會成為害群之馬。
《決議文》當中又稱：「只要認同香港

這片土地、認同香港核心價值和文化，就是香港人民」。這正是激進反對派一直以來的論調，假借所謂「本土」之名，利用甚至扭曲港人的認同情感。事實上「本土」所代表的情感存在諸多歧義。人的情感本身就是複雜而不能割裂的，「本土」怎麼可能只指某區民眾對於成長之地的感情，卻與該地區所在的國家、民族割裂開來？激進人士以偏頗的論述，切斷歷史淵源、民族血脈、文化傳承，甚至公然挑戰國家的概念，到底基於一種什麼樣的立場？這是激進派人士一直未能釐清的一點。

「本土」被「港獨」綁架

在這樣的情況下，港人尤其是年輕一代，對於「本土」的理解是認識不一，甚至是南轅北轍的。而近年社會政治化加劇，更令「本土」論被激進「港獨」綁架，並成為訴諸於極端手段的政治「犧牲品」。「本土」和「港獨」政團的所作所為，在本質上已沒有分別。暴力抗爭被納入激進分離勢力達至政治訴求的必要手段，應引起社會各界的警惕。年前的「佔中」也曾披上「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的外皮，但其採用的手法仍屬違

法暴力，對近年本港社會在各方面的發展都造成了沉重的打擊，港人有目共睹。因此社會各界對有關激進分離勢力，無論是明目張膽打着「港獨」之名，還是似是而非地打着「本土」之論，都應分清對錯、直斥其非，為本港的發展正義發聲，為本港的未來保駕護航。

反對派政黨中的年輕人聯合發表《決議文》擁護「自決」論，其實質即仍是走「港獨」激進路線。全體港人應認清「自決」不過是經過「喬裝」的「港獨」，意在九月的立會選舉中騙取選民手中一票，旨在製造假民意，與本港社會的整體利益相悖。而各派政界人士尤其是建制派應發揮中堅力量，積極作為，發正義之言，行正義之事，為本港的發展，為立會選舉，為社會正能量的凝聚發揮重要作用。同時做好防備，防止違法暴行伺機再次衝擊社會的穩定和發展。

「港獨」違背歷史發展規律，悖離民心民意，終將被淘汰出局。社會目前的發展縱然存在問題，但本港的優勢仍在，港人應充滿信心、理直氣壯地直面挑戰、衝破迷霧、共同謀求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會長

低津計劃須政策配套

行政長官梁振英自上任以來，以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為特區政府之施政方向、施政重點。他在2014年已經提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

劃(下稱低津計劃)，奉行鼓勵就業和多勞多得的理念，旨在由根源上減輕本港跨世代貧窮問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早前表示，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在五月便開始接受申請，計劃將為合資格的家庭成員按比例提供津貼。筆者認為，以實際經濟收入鼓勵弱勢家庭成員主動就業，不但有望減輕社會勞動力不足問題，長遠還可為本港勞動市場締造新氣象。不過，筆者認為低津計劃中執行細節有待改善之處，也需要其他政策配合，並加以宣傳，這樣方能取得理想的政策成效。

簡化申請程序

筆者同意，計劃能激勵更多人士投入職場，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根據政府統計處公開資料，未來本港整體勞動人口，按目前估算，將由2018年的365萬，降低到2064年的311萬。可見，勞動力正面對下降趨勢，屆時定必影響經濟及市民生計。經濟若要持續發展，補充勞動力可謂是不可或缺的一環，而低津計劃則有望為勞動市場注入新的動力，及早紓緩貧窮問題。

筆者之所以認為低津計劃有尚待改善之處，在於現時申請程序過於繁複，尤其不利經常轉換工作的兼職申請人參與。有傳媒報道，單單是填寫申請表格，就需要用上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較早前，亦有關注組就計劃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示近五成受訪者對需要繁複地提交多份資料文件感到煩擾。筆者認為，計劃要真正有效地推行，首先要簡化申請程序方便到市民，畢竟不是每一個基層人士都能夠輕鬆處理繁複的手續。

此外，在家照顧子女的婦女，其

潛在勞動力極大，如何利用好計劃，釋放她們的勞動力，也非常值得政府深思。筆者所屬的社福機構，早前發表了一份名為「

內地新來港定居人士社會參與狀態」的調查報告，接受問卷訪問的大部分皆為女性會員，數據顯示只有三分之一受訪者加入勞動市場，而沒有投入勞動市場的受訪者中，有超過八成受訪者希望投入職場，但礙於要照顧家庭成員，只好待在家庭中打理家務。

協助婦女就業

依報告結果的分析，婦女未能投身全職工作，因為大多數的新來港家庭中，婦女需要照顧平均2名小孩。婦女在家庭中壓力沉重，同時對家庭經濟開支也構成相當大壓力，這也是造成家庭貧窮主要因素之一。故此，低津計劃要取得更大的成效，就不能忽視需要照顧家庭的婦女。筆者提議，政府在推出低津計劃的同時，應該為家庭婦女潛在的勞動力（當中包括內地新來港婦女及少數族裔婦女等）進行有系統的研究，並依研究結果具針對性地加強資助託兒服務。在未來勞動力下降的趨勢下，協助婦女就業，成為補充勞動力市場的重要來源。

筆者認為，穩定的工作收入對家庭和諧，以至社會持續發展均非常重要。政府在推行扶貧政策的同時，必須考慮政策的可行性，例如申請程序不能過於繁複，以及政策是否能成功「落地」，目標要眾能否清晰接收相關資訊等。此外，倘若扶貧方案需要其他政策配合，政府不應把項目只作為單一的政策推行。諸如欲釋放勞動力、鼓勵就業的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如果希望更多婦女參加計劃，就應該有其他相關政策配合，讓計劃推行得更加成功，以紓緩本港即將面臨的嚴峻挑戰。

香港新家園協會服務總監

議事論事

戴 韋

香港是一個經濟老成，卻面對政治「邪明」的社會。今年九月，香港立法會選舉；明年三月則將舉行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近來香港社會給人一個紛擾的感覺；隨着那兩場選舉的臨近，亂象在短期內還可能變本加厲。

立法會選舉和「港獨」勢力本來是兩件不相干的事情；但由於當前「港獨」思潮冒起，並對年輕人有一定的影響，故亦會影響選舉結果。

香港是一個經濟老成，卻面對政治「邪明」的社會。今年九月，香港立法會選舉；明年三月則將舉行第五屆行政長官選舉。近來香港社會給人一個紛擾的感覺；隨着那兩場選舉的臨近，亂象在短期內還可能變本加厲。

代表港青。
受到美國傳媒熱捧的黃之鋒，背後勢力給他的「歷史任務」，是鼓勵更多香港站出來與現建制作鬥爭。前些日子還在與他激進反對派人土爭拗捐款問題的他，近期到美國多間大學「巡迴演說」，他的觀點包括引發國際討論香港的二次前途問題。可以概括地說，當前香港反對陣營有兩種趨勢：一是內部競爭白熱化；二是鬥爭方式激進化。他們的觀衆不僅包括香港社會，北京在警惕他們，西方捐款者也在評鑒他們的表現。

美國的人權報告提到了雙位數字的香港反對派人土，基本上包括了現在所有見報的激進反對事件，往往反移民或反遊客，不尊重別人的人權，有明顯的極右色彩；「港獨」政黨則甚至連民主都講得不多。

「港獨」觸及了國家的底線。繼自註冊被拒的「香港民族黨」召開記者會後，中央官員對「港獨」的強硬批判態度日漸清晰，從原先強調法治發展，到近日對其涉及叛逆、煽惑離叛、和煽動叛亂的指控，那也預示官方將採取進一步行動。「港獨」分子因而感到壓力，後繼者漸漸地多稱「本土」，少談「獨立」。當然，實質其實都是一樣的。

香港仍有人替「獨派」辯護：然辯護者大抵均先稱「本人不贊成『港獨』」；然後才指在口頭上宣傳「港獨」而非付諸行動者無罪。外國勢力積極為香港激進反對派人物張目；也給那些辯護人士撐腰打氣。

現在，香港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已大不如前，香港的制度優勢也「買少見少」；但香港作為中國境內唯一的資本主義國際大都會，於國家發展仍地位重要。因此，開放的香港比一個封閉的香港對中國更有利。但是，那有一個前

提，就是香港必須已經而且繼續在國家主權範圍內經營。但如果國家任由「港獨」等激進勢力繼續違法滋事，國家將不能再利用香港現行的「一國兩制」來為民族復興服務。

筆者並不看好那些現正宣傳「港獨」、保護本土，或揚言參選的港青，會有長遠政治前景。他們當中多數人未來在香港政壇冒起的機會，低於許多眼下的醫科學生、律師行的見習生、政府行政主任、工會活躍分子等等，甚至還會低於許多年輕的、仍保持「沉默大多數」形象的精英階層。

「港獨」冒起政壇

「港獨」思潮的本地因素，包括作為高收入經濟體的香港，在過去廿年發展緩慢所衍生的兩代人之間的失衡、財富分配和政治權力差距過大、「商人治港」期間未能警惕兩地經濟融合所產生的一些負面效應等。

外圍環境因素則包括美國民主黨政府重返亞洲政策，和台灣民進黨在今年選舉中獲勝等。這兩者中，美國因素影響最大；台灣選舉結果則主要是讓「港獨」勢力受到鼓舞。而說「港獨」思潮冒起，是梁振英政府施政失誤的結果，是偏頗的。

在近年一連串反政府事件中，在馬路上、校園內、政府總部和立法會前的肆意妄為，令少數偏激港青飄飄然，紛紛拉虎皮作大旗進軍政壇。結果是反對派陣營分裂出激進反對派，激進反對派又分裂出「本土主義」，「本土主義」又分裂出「港獨」勢力。

可以理解某些港青對前途感到迷茫；但領頭的「獨青」則是一些利令智昏的個人，不能給那些辯護人士撐腰打氣。

現在，香港對國家經濟的影響已大不如前，香港的制度優勢也「買少見少」；但香港作為中國境內唯一的資本主義國際大都會，於國家發展仍地位重要。因此，開放的香港比一個封閉的香港對中國更有利。但是，那有一個前

卻已經開打。因此，所謂梁振英「機場事件」，近期成為有意競逐各方爭鬥的另一個焦點。筆者預感，中央政府希望來屆行政長官選舉是有競爭的。前陣子，民建聯表示希望成為執政黨，則主要是給反對派一種壓力。而回歸二十五年後，即「五十年不變」的下一階段，屆時的情況當然另論。

反對陣營疑似傾向支持某些政府高官出來競選，機場鬧事則是對梁施壓的方式。而高官們現在公開稱仍無意參選下屆特首，那是聰明人講的聰明話。平心而論，前車可鑒，高官若現在就想再上一層樓，可謂非明智了。

在另一方面，近日梁振英作證黃毓民在立法會捉奸案，稱不能姑息議員「捉奸」——之前有人姑息我管不到，但我不會姑息」，且一唔係我梁振英一個人嘅問題，係整個政府嘅問題。如果該案的審結能達到梁作證的目的，以法抑暴，那將有利梁擬聚建制派內的各派力量。

「五一」節就到了。每年一到這個時候，勞工階層、工會團體都例必舉行各種活動包括酒會及遊行，以示慶祝這個勞工大衆節日，以及向有關當局反映勞工訴求和不平。今年也不例外。

從現實來說，自香港回歸之後，勞工階層的確得到特區政府在各方面的重視，例如將五月一日定為法定有新假期；政府有關部門也在「五一」節前夕舉辦慶祝勞動節酒會，廣邀不同勞工團體和工會負責人出席；更委任一位勞工界代表人物進入政府行政會議作為成員，以便反映勞工階層意見及建議。所有這些，在「九七」回歸前之港英政府是從未有過的。在改善和保障勞工階層權益方面也做了不少修訂工作。例如設立最低工資立法，修訂許多勞工不公平待遇如工傷事故、遣散賠償；推行僱員強積金計劃等等。勞工階層得到應有保障遠比回歸前得到很大改善和進步。這是值得勞工階層認同和歡迎的。當然，還有一些不如意的問題，仍待政府、勞方及資方三方面進行磋商解決。例如當

下面對的設立標準工時立法問題，就是其中之一。大抵需要各方面商談、作出妥協，需要時間和一個過程才會得到解決。不能三年再拖三年。

「合約工時」南轅北轍

標準工時，在香港任誰也說不清楚。因為早在上世紀二三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除了一些文職行業以及政府公務員有所謂朝九晚五的八個小時工作之「規定」之外，其他衆多行業都沒有定時返工定時放工的，尤其不少以勞力為主的行業。可以說，任由僱主老闆說了算。其原因，大抵是一半由行業傳統性質所致，另一半原因則是當年沒有勞工組織進行爭取。一直「拖」到今時今日。大有一種習非成是的性質。

近年勞工界爭取的所謂標準工時，應是根據現在一百多年前國際勞工組織所提倡的爭取到的「三八制」的標準工時，即每天二十四小時，分八個小時工作，八個小時休息

有話要說
文滿林

，八個小時睡眠。這是最早的最理想的「三八制」標準工時。在一百多年前西方一些國家尤其是工業國家所實行的。但在一些非工業國家及落後國家並沒有實現。

然而作為國際大都會的香港，究竟要不要實行「三八制」之標準工時制度，近年來一直引起爭議。尤其面對企業大僱主老闆的反對。因為，制定和落實標準工時立法，必然影響和衝擊僱主的利益，尤其是在不少行業奉行沒有定時放工的環境下。當然更多的是憂慮行業本來是每日工作十小時或更長工時的，現在一旦立法實行八小時的所謂標準工時，讓工人提早兩個小時收工，減少兩個小時工作，很大程度受到損失。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們在計算成本時，習慣計算工人工作十個小時而不是八個小時。僱主老闆

對制定推行標準工時提出反對和擔憂是不言而喻的。故當下之「標準工時委員會」之資方代表提出另一種計算標準工時方式，就是「合約工時」來代替勞工團體提出的「標準工時」。

政府也應積極斡旋

從性質來說，「合約工時」與「標準工時」有不同的分別。「合約工時」主要是由老闆僱主在招聘工人時制定一個工時合約讓應徵工人去簽。全由僱主作主導，工時可能是八個小時，也有可能是九個小時、十個小時或十一二個小時。「合約工時」定出之後，做不做由應徵工人考慮。要做這份工作的，就得要簽要履行，要麼就做不成那份工。僱主提出的這種「合約工時」顯然與標準工時南轅北轍，有違標準工時的原意和性質的。

從另一層次和概念來說，什麼樣的工作時數才是標準工時呢。至今，勞工界仍未提出一個準確的時數，是八個小時呢，或者是

九個小時或十個小時才是標準工時。假若勞工界明確每日工作九個小時為標準工時的話，看看僱主老闆的反應如何，作為一種試探方式。這不失是個妥善的作出善意的解決方法。總比現在僵持不下的勞資雙方「標準工時委員會」各有各行實際得多。而作為政府也應該積極進行斡旋。

標準工時立法是當下勞資雙方有待解決的、且是最關鍵的勞資關係問題。香港是國際大都會，周邊國家和地區都先後推行標準工時，難道香港還要繼續拖下去嗎？盡快推行標準工時，不但洗脫勞工階層幾十年來一直受到僱主老闆剝削的「污名」，同樣也為老闆洗脫利用工時剝削勞工的「罪名」。勞工階層享受標準工時帶來之一種尊嚴以及一種平等的工作環境和休憩時間，比什麼都重要。同時也必然在工作中帶來動力，為公司老闆帶來裨益，相得益彰。若下，為標準工時立法爭持不下，雙方僵持下去，無論對勞工階層、對公司企業老闆甚至對整個香港社會都不是一件好事。 香港華人革新協會副會長